



广东党史 研究文集

(第四册)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广东党史 研究文集

(第四册)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071号

责任编辑：彭咏梅

责任校对：邹祖兴

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四册）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 2581570 **传真：**(01) 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25 印张 290 千字

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3100 册

ISBN 7-80023-725-7/K·673

定 价：10.20 元

目 录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	
.....	陆永棣 刘子健 (1)
华南游击纵队的建立、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陈立平 (17)
东江纵队胜利北撤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李一明 (26)
谈琼纵对“北撤”、“南撤”问题的正确处理	徐 冰 (37)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潮汕特委贯彻“分散坚持、 保存力量、隐蔽待机”方针述略	余延年 (46)
粤赣湘边纵队的战斗历程及历史作用	
.....	江士雄 谢杞生 何焕昌 (58)
江南支队反“清剿”斗争的经过及其特点	邹金城 (70)
五岭地区武装斗争史略	唐克文 (78)
北江第一支队的战斗历程	刘希孟 (90)
“先粤东后闽西南”战略方针的确立及其历史 贡献	廖金龙 (102)
浅谈潮汕地区梅花形游击根据地的形成及其 战略意义	蔡 超 (110)
武工队在潮汕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王宋斌 罗志刚 (119)
大埔解放的历史作用	卓加里 赖柱胜 (131)
粤桂边区武装斗争概述	陈光中 黄稻藩 (138)
打通粤桂边走廊	韦理树 沈汉英 何 文 (150)
连江支队党的建设	冯顺全 (155)

解放战争中党领导的西江两岸人民武装起义	
.....	中共德庆县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郁南县委党史办公室
(163)	
论粤东起义	张志平 (172)
东江地区实现北平方式解放的一个成功实例	
——组织发动保安第十三团起义	杨锦照 (183)
饶纪绵率部起义的历史意义	陈遐璇 莫 巍 (189)
陈赓桃起义始末	中共茂名市委党史研究室 (198)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对新政协的历史	
贡献	刘子健 林 益 (207)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香港的宣传文化	
工作	丁晋清 (215)
华南解放区经济工作述略	叶文益 (224)
广州地下学联综述	胡泽群 曹 直 (235)
始终自觉按党的指示办事	
——试析广州地下学联的一条基本经验	徐邵陵 (250)
解放战争时期的广州学生运动	曹 直 (261)
解放战争中广东妇女的历史作用	陈志云 陈丽珠 (273)
解放战争中的汕头地下斗争	秦梓高 (281)
解放广东诸战役	罗茂繁 高宏的 (297)
广东战役中的阳江围歼战	许名炽 (315)
解放北江地区概述	廖桂洲 (322)
雷州半岛人民支援南下大军解放海南岛	方良锋 (330)
南方战争史的壮举	
——解放战争后期广东支前工作述评	陈立平 (338)
解放战争时期活动于粤桂湘三省边区党组织	
名称的考证	韦敬文 (348)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建立 及其主要活动

陆永棣 刘子健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华南各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复杂环境中，坚持武装斗争，发展和壮大人民的革命力量，建立了武装队伍和革命根据地，最后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华南和广东全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1949 年 9 月赣州会议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作出了《关于过去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了香港分局的工作。

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先后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独立纵队、韩江纵队、粤中、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共约 2.8 万人。1945 年 7 月，成立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区委遵循党中央关于争取实现全国和平民主的方针，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和坚决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广东当局妄图消灭我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阴谋，迫使它与我党签订了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

1946 年 6 月 30 日，东江纵队 2583 人北撤山东解放区，一部分暴露的干部转移外地或海外隐蔽，其余人员复员。为顾全大局，

我党还表示：广东境内除海南岛外，其他地区将不自动作武装斗争。

蒋介石反动派背信弃义，于1946年6月26日挑动全国内战，在我东江纵队北撤后，对华南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剿匪”的军事扫荡，疯狂捕杀我复员人员和家属，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镇压民主运动，推行三征（征兵、征粮、征税）苛政，实行法西斯统治。

为了迅速恢复华南的武装斗争，发展人民群众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党中央于1946年7月派方方同志到香港，负责华南党的领导工作。这时广东区委部分成员已随东纵北撤，有的被派往海外工作。尹林平原拟北撤，后奉命留下，仍任广东区党委书记，兼新成立的港粤工委书记。广东区委增补梁广（后为黄松坚）任副书记。同年10月，尹林平与方方一起筹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同年下半年至1947年春，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龚澎、夏衍、林默涵、邵荃麟等一大批重要干部也先后到达香港，会同饶彰风、廖沫沙、黄文俞、李超等同志加强党在香港的宣传、文化、统战工作。在此期间，成立了报刊工作委员会，以章汉夫为书记，出版发行的刊物有《华商报》、《正报》、《经济导报》、《群众》杂志以及英文半月刊《今日中国》；乔冠华、萧贤发等同志建立了新华社香港分社；许涤新等同志开展了经济活动，为党筹措经费。1947年1月16日，党中央决定建立香港分局。同月31日，方方、尹林平致电中央，拥护建立香港分局。1947年5月分局正式成立，全面开展工作。分局直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与上海中央局发生必要的联系，并受其指导。委员有：方方、尹林平、章汉夫、连贯、梁广、潘汉年、夏衍同志。由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后增设饶彰风为秘书长。1949年4月，香港分局奉命改称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委员有：方方、尹林平、梁广、冯白驹、冯燊、魏金水、林李明（李明），候补委员有周楠、庄田。秘书长职由李嘉人于同年5月

接任。香港分局管辖华南等地党的工作。下设平行组织：香港工委、城委和各地区党委。这是根据党中央关于严格区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指示而建立的组织系统。分局、城委和各地区党委是秘密的第二线机构。分局专门领导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先后建立了中共粤赣湘边区党委（书记尹林平）、闽粤赣边区党委（书记魏金水）、琼崖区党委（书记冯白驹）、粤桂边区党委（书记梁广）、粤中临时区党委（书记冯桑）、粤桂湘边工委（书记梁嘉）、滇桂黔边区党委（书记林李明）。分局还设立了农村工作委员会（简称农委或军事组），负责这一项工作，由方方、尹林平同志直接领导。先后与各地区联系武装斗争工作的同志有黄松坚、梁嘉、欧初、林李明、林美南、方东平、李云、陈健、张森等同志。城委专管华南各城市的地下工作，由梁广、冯桑、陈能兴、钟明等同志负责。香港工委是半公开的第一线机构，专管香港及华南、南洋公开的统战、报刊、文化、外交、经济、华侨、群众工作，“以便分局本身及其他两项组织都能与公开工作分开，尤其要使香港及广州、南洋各地当局只知港有工委活动，不知其他。”1947年6月，中共香港工委成立，书记章汉夫、副书记连贯。章于1948年7月到中央汇报工作后调天津工作，工委书记先后由夏衍、乔冠华、饶彰风继任。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华南分局）及其下属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健全，使我党在华南的工作得以全面开展起来。

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主要活动

（一）恢复和发展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华南地区的正规军队几乎全部北调，粤、闽、桂、赣南、湘南均靠保安总队防守，力量空虚；同时，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顽固坚持内战独裁政策，横征暴敛、拉丁征税，致使国统区危机重重，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群众斗争

日益高涨。而我北方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北撤后我留在各地的武装人员坚持斗争；琼崖游击战争蓬勃开展。这些表明，华南地区恢复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领导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

1946年11月，方方、尹林平根据中央《给南方各省工作指示》作出了恢复广东武装斗争的决定。随后，又根据党中央关于“不要急于打大仗，也不要过早集中武装建立根据地，而应分散武装发动群众，先从多消灭乡村的反动势力及地主联保武装做起，在广大乡村中站稳，为建立根据地奠定基础”的指示精神，以及华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这一实际情况，提出了“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即先把武装星罗棋布地分散发展，播下发展武装斗争的“种子”。并指出，当前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是：打击地方反动武装，不要过早与保安团队作战。同时，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在农村中建立反蒋、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的统一战线，以发动群众对游击战争的支持和援助。1947年4月，方方、尹林平对华南地区游击战争发展作了整体部署，并提出“建立边界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得到党中央的同意。在此前后，各地党组织以隐蔽武装纷纷举起武装斗争旗帜，四出活动，到处出击，摧毁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建立山区游击据点。这样，游击战争的星星之火，很快燃遍粤东的大埔、梅县、兴宁；潮汕的普宁、揭阳；东江的惠州、博罗、增城；北江的南雄、始兴、英德、新丰、龙门、佛冈、和平、连县；中区的南海、番禺、中山、台山、开平、恩平、阳春；南路的钦州、廉江、遂溪、化县；西江的广宁、怀集等地。而琼崖独立纵队则粉碎了敌之“重点进攻”、“全面清剿”，初步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到1947年9月，我武装队伍（琼崖未计）由北撤后不到2000人增至1万多人，平均增长3倍半，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粉碎了张发奎、罗卓英妄想把我北撤留下的武装力量拔掉的

所谓“拔钉”计划。

当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揭开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后，蒋介石政府为把广东变为其内战的最后基地，于1947年9月派宋子文到广东任省府主席。他一到广东，加紧勾结美帝、拉拢邻省和地方反动势力，实行“三征”，扩编保安队。从1947年12月开始至1948年，向我人民武装发动了两期军事“清剿”。

根据敌情的变化和我武装力量的发展，香港分局于1947年10月发出《为迎接大反攻加强农村斗争的指示信》。1948年2月，召开高干会议，并发出《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提出“普遍发展、大胆进攻”的方针，布置各地大搞武装斗争，并进一步提出建立主力部队，协同地方武装打击敌人的进攻，建立新区的任务。香港分局还陆续派出林平、冯燊、梁广、吴有恒、周楠、庄田、温焯华、梁嘉等同志分赴各地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

在香港分局和各地党委的领导下，我各地武装迅速组建主力部队，主动出击，胜利地粉碎了宋子文两期军事“清剿”。在上半年，兴梅支队粉碎了敌人的“十字扫荡”，潮汕人民抗征队打退了敌人对大南山、八乡山的进攻。西江两岸的党组织领导了德庆、郁南等县的武装起义。南路人民武装突破敌人的“重点围剿”，举行东西进军，发展了粤桂边和粤中的武装斗争。特别下半年，在香港分局八月指示和行动纲领的指引下，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深入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更广泛地开展反“三征”斗争，在我根据地和游击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借粮救济，帮助发展生产，还普遍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使群众斗争走上正确的轨道。这时，全省农会会员约40万，民兵约7万左右。群众斗争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东江江南的人民武装，虽遭敌之重点进攻，但由于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主动组织了沙鱼涌袭击战、山子下伏击战等战斗，歼敌有生

力量，使敌折损兵力 1/4，取得了粉碎敌 6000 人重点进攻的重大胜利。粤北九连地区再度遭敌进攻，九连支队积极创造有利战机，取得了五战五捷的战果。南路人民武装成功地攻入湛江市，全歼守敌，扭转了该地区的战局。粤中人民武装在新兴、高明交界的布辰岭，以 3：2 的兵力伏击进攻之敌，取得全歼战的胜利。粤东人民武装取得湖寮、宝坑战斗的胜利，建立大小 13 块游击区和根据地，占兴梅地区一半。粤桂湘边人民武装挺进连县、阳山，发展小北江的斗争。琼崖纵队的军事成就更为显著，在秋季攻势中，横扫陵水、万宁、乐会、定安等县，解放了 16 座墟镇，巩固了白沙、保亭、乐东中心根据地，把游击区扩大到沿海地区。

到 1948 年底，我粤赣湘、闽粤赣、粤桂边、桂滇边、粤中等区已建立起主力部队，武装人数发展至 4.59 万人，战斗力显著提高，根据地和游击区由山区推进到平原。据不完全统计，我人民武装在粤、桂、闽、赣、湘 6 个省建立了控制、半控制和活动地区共 185 个县，广东发展最为普遍和巩固，除南澳县以外，其余 99 个县都有我游击队活动。宋子文只好哀叹“唱完了最后一曲”，悄悄下台。

香港分局根据党中央关于“一九四九年是南方游击战和游击根据地大发展的一年”的指示，和华南斗争形势的特点，制定了“全面发展，重点巩固”的方针，要求各地完成大块根据地的建立，以迎接南下解放军解放华南。1月1日，香港分局发出《关于迎接大军渡江和准备解放广东的指示信》，指出：我们的工作布置应朝向首先解放粤汉路东的粤闽赣湘数十县及路西二三十县，以包围广州夺取广州。此时，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于 1 月宣告成立。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也于 7、8 月先后宣告建立。粤桂湘边部队（西江部队）按纵队的编制进行活动。南方人民武装迅速壮大，为迎接解放准备了坚实的力量。

根据分局的战略部署，各边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向敌人发动

了春季攻势。春季攻势的胜利，使广东形势出现新局面，我在军事上已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打破了敌对我根据地、游击区的分割、封锁，并对敌占城市形成包围的态势。党中央、华南分局为此分别致电祝贺。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主力渡江，敌面临总崩溃。22日国民党总统府南迁广州，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为加强领导华南地区的斗争，迎接华南的解放，香港分局改称华南分局，分局领导机关于5月由香港内迁粤东梅县。5月7日，华南分局发出《对大军渡江后华南工作的布置》，指出：“在大军未到之前，我们必须将农村完全解放，控制在我手内，以便到时大军可集结力量解放城市及追歼残敌。”还要求各地加紧做好城市接收的准备工作，便于大军到达时立即有计划接收。

遵照华南分局的战略部署，各地主力部队在取得春季攻势胜利之后，又加强了对敌的攻击。粤赣湘边纵队与闽粤赣边纵队协同作战，把以东江和韩江为中心的两大块根据地联成一片。5月中旬，在我军事打击和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将领吴奇伟、李洁之、曾天节、魏汉新率保安十二、十三团和独立营，共三四千人先后在梅县、龙川、蕉岭、流沙起义。到6月，闽粤赣边纵队先后解放了梅县、大埔、兴宁、蕉岭、惠来、平远、饶平等县城，建立了潮梅行政委员会及10多个县的人民政权。此时，闽西专员练惕生和傅柏翠率部3000多人在龙岩、上杭等地起义，闽西解放了龙岩、上杭、永定、武平、长汀、连城、永安等县。粤赣湘边纵队主力先后解放了五华、龙川、紫金、和平、新丰、连平等县城，建立了东江行政委员会及11个县的人民政权。两个纵队解放了由龙岩到河源，由平远到海陆丰纵横千余里的广大地区。粤东残敌被迫在韩江三角洲和东江下游惠州一带，据守几个孤立的据点，敌在韩江、东江的基地实际已陷于瓦解，我军则达到从东面对广州的战略包围。8月，广东省大多数乡村已获解放，解放区人口约有1350万人。占当时全省人口的40%以上，有1/3地区已建立人民

民主政权，开始了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武装部队发展至8万人，为南下解放军进入广东作战扫除了障碍，为最后解放华南、广东，追歼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叶剑英同志在赣州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商议和部署解放华南和广东的重大问题。会议组成了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的新的华南分局。会后，南下大军二野四兵团和四野十五兵团分三路向广东进军。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赣州会议精神，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发动和组织全省人民群众开展迎接大军的支前活动，保证南下部队的物资供应和运输畅通，并积极策应南下大军作战，加快广东战役的取胜。10月14日华南最大城市广州解放。广东战役结束后，我琼崖纵队和全岛人民积极配合十五兵团，取得渡海登陆成功。1950年4月31日，海南全岛解放。8月，万山群岛也获解放。至此，广东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二）加强广州等城市的工作，大力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加强了广州等城市工作，从东江、北江等抗日根据地抽调了不少的党员来广州，充实和加强广州的党组织。1945年九十月间，中共广州市工委成立。1946年初，正式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在此期间，党还先后在中山大学、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院校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工人、妇女中开展工作。根据广东区委指示及广州的实际情况，市委决定必须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当前要着重恢复组织，站稳脚跟，开展群众工作，准备组织斗争。在接收各地调来的党员的组织关系的同时，即以中山大学为重点，开展群众活动和斗争。1946年1月30日，即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结束前夕，为了庆祝政协成功以及声援昆明爱国师生的正义斗争，中共广州市委领导中山大学、中华文化学院、中大附中等校2000多学生举行“反内战、争取民主”的

示威游行，教育了群众，扩大了社会影响。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逐渐高涨。1946年12月30日，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人民群众的无比义愤和强烈抗议。1947年1月7日，在广州党组织领导下，中大、中大附中、中华文化学院、省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的爱国学生2000多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示威大游行。他们不怕流血牺牲，冲过敌人的沙包、铁丝网，到沙面美国领事馆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等口号。同月10日，香港、九龙青年成立沈案后援会；广东各民主党派和港九各界反内战大同盟也先后发表告同胞书和通电，坚决抗议美军暴行，要求废除中美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对这次沈崇事件，党中央指示各地城市党组织“不要卷伏不动”，即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香港分局书记方方也指出：“现在群众斗争是放手大搞，有理、有利、有节”。据此，广州党组织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在进步学生迫切要求党领导，要求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广州党组织于1947年3月29日正式成立了“学生爱国民主协会”（后改称地下学联）。从此，“爱协”成为党在学生中的秘密外间组织，发挥了先锋作用。

同年5月31日，中山大学、国民大学、中华文理学院、中大附中等校学生3000余人为声援京、沪、苏、杭地区爱国学生运动，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途经长堤，遭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殴伤三四十人，造成“五卅惨案”。当晚又捕去师生近百人。爱国学生坚持斗争25天，迫使反动当局释放被捕师生，取得斗争的胜利。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整个爱国民主运动走上高潮。这时处在饥饿挣扎中的工人群众也起来进行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纷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工潮从1947年2月底开始到3月中旬达到最高峰。据不完全统计，罢工浪潮波及30个行业，人数达20万人以上。广州地下党在运动中引导群众组织起来，把群众斗

争提高到新的阶段。至1948年底，先后在学生、工人、教师、妇女、职员等各阶层群众中成立了5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协会、新民主主义工人协会、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者协会、新民主主义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者协会），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战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同时，广州、香港等地党组织还输送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回内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华南分局下达的“城市运动要支援农村游击战争，实行城乡结合”的任务。

（三）团结、教育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发展反美反蒋的统一战线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加紧其法西斯统治，不少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上层的爱国人士遭受迫害。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香港分局配合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的党组织，帮助一大批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分局还根据中央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及《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在香港工委属下专门设立统战委员会，具体负责争取和团结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

1. 向民主人士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推动其进步。

1948年，美帝国主义加紧扶植中国的所谓“第三势力”，妄图以此阻挡中国革命的前进。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所谓“告中国人民书”，企图诱引那些“曾受教育的爱国人士组成新党，支持政府，致谋和平的努力”。于是“中间路线”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应运而生，北平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应声成立。这些理论和活动，引起了革命人民的警觉和理所当然的反对。对此，党中央指示在香港出版发行的《群众》杂志的第一位任务是，批判“中间路线”。香港分局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组织力量对那些幻想走“中间路线”，搞“第三势力”的人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

章汉夫亲自撰文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在港的进步报刊也先后发表文章抨击所谓“自由主义运动”和“中间路线”。在我党的组织下，《华商报》主持召开了批判“自由主义运动”的座谈会，出席的有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侯外庐、邵荃麟和李章达等。他们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自由主义运动”的实质就是粉饰蒋政权。接着，又在《华商报》上，发动了一次对“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批判，揭露了那些抱着“中间路线”旗帜的团体活动目的，是妄图阻挡革命力量的发展，为日暮途穷的反革命力量散布幻想，延长反动统治的寿命。香港分局组织的对“自由主义运动”的批判，有力地打破了一些人对“中间路线”的幻想，教育和帮助了摇摆不定的民主人士，促使他们支持人民解放战争。

2. 帮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建立和发展组织。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使广大中间阶层进一步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失去对蒋政府的信心，并证明“中间路线”，走“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各民主党派在对自己的前途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香港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慎重地做好民主党派及其所代表和影响的中产阶级、海外侨商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工作，说服他们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统一起来。1948年1月1日，由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出面，在香港召开了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席会议，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蔡廷锴、朱蕴山等为常务委员。在《成立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的主张。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等在香港分局的推动和具体帮助下，积极恢复民盟组织和筹备召开民盟三中全会。1948年1月5日在港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中间路线”的思想，谴责了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举动，宣布恢复民盟领导机构，并在其政纲上表明民盟决心同中

国共产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携手合作。中国致公党也在此之前在香港召开了代表大会，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他民主党派也积极参加了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

3. 发挥民主人士在人民革命事业中的作用。

遵照党中央团结大多数的方针，香港分局十分重视发挥民主人士在人民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通过同民主人士合办《华商报》，以这个阵地同民主人士取得密切合作。把报纸办成一张接受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报纸。当时《华商报》董事长由爱国民主人士华比银行华人副经理邓文钊担任，董事会属下的各机构，都由一批知名的编辑、记者担任，还得到全国一些著名教授、作家、艺术家的撰稿支持。《华商报》成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在华南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

我党还同民主人士合作，在1946年夏创办了达德学院，由民主人士陈其瑗担任院长，邀请了许多有名望的专家、教授来任教。在党的关怀下，达德学院办得生动活泼，远近闻名，吸引着许多要求进步的有志青年，前来求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革命事业的骨干。

4. 团结海外华侨，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

根据中央的指示，香港分局先后派出一批干部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联系各阶层的华侨，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扩大我党在华侨中的影响，激发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动海外华侨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如对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分局指派党员经常同他取得联系，对他的爱国热情给予高度的赞扬，促使他坚定地支持祖国的统一、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广大侨胞在他的带动下，积极出钱、出力，捐献大量物资支援解放战争。

（四）以香港为主要阵地，推动新政协运动的发展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已取得伟大的胜利。为了向全国人民指出新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